

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

杨乾银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3日

摘要

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强, 收入风险已成为影响家庭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本文利用2015至202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五轮微观追踪数据, 构建非平衡面板, 系统考察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 收入风险显著抑制家庭经济韧性, 其中暂时性风险的负面冲击尤为剧烈。为缓解内生性问题, 选取“社区内其他家庭收入风险的中位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 保险支出通过风险分担效应缓冲了收入风险的负面影响, 而资产流动性约束则放大了这一负面效应; 发展型消费在收入风险与家庭经济韧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收入风险通过抑制家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长期投资, 间接侵蚀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 低收入、低学历及社会资本薄弱的家庭是风险冲击下的主要脆弱群体。本文为理解收入风险如何影响家庭长期发展能力提供了新视角, 并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保障发展型消费投入提供了政策参考。

关键词

家庭经济韧性, 收入风险, 发展型消费, 保险支出, 资产流动性约束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come Risk on Household Economic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Database

Qianyin Yang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Received: March 6, 2026; accepted: April 6, 2026; published: April 13, 2026

Abstract

With increasing economic uncertainty, income risk has become a core factor affecting household

文章引用: 杨乾银. 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26, 16(4): 76-87.

DOI: 10.12677/sd.2026.164136

economic stability. Utilizing five waves of micro-tracking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from 2015 to 2023,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unbalanced panel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income risk on household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come risk significantly suppresses household economic resilience, with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ransitory income risk being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To mitigate endogeneity issues, the median income risk of other households within the same community is selected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for estimation, and the results remain robust.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nsurance expenditure buffer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come risk through risk-sharing effects, while asset liquidity constraints amplify this adverse effect. Developmental consump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come risk and household economic resilience, as income risk indirectly erodes resilience by restraining long-term household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low-income, low-education, and socially disadvantaged households are the primary vulnerable groups under risk shock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understanding how income risk affects households' long-term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offers policy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lleviating household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safeguarding developmental consumption investments.

Keywords

Household Economic Resilience, Income Risk, Developmental Consumption, Insurance Expenditure, Asset Liquidity Constraint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全球格局深刻变革与国内经济结构持续转型相互交织,家庭层面面临的收入风险显著攀升。去全球化思潮涌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外部不确定性,通过多重渠道传导至国内,显著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从国内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步入深水区,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在催生新业态的同时,也对传统就业模式构成系统性挑战,就业形态多样化与就业稳定性下降并存的特征日益凸显。加之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共同导致家庭层面收入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在此背景下,家庭经济韧性——即家庭在面临内外部冲击时,通过调动各类资源、调整消费储蓄行为、改变资产配置等方式,抵御冲击、适应变化并实现恢复和发展的综合能力——其重要性愈发凸显。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均对提升家庭经济稳定性和韧性提出了迫切要求。

有关收入风险的文献主要探讨其对个体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涵盖金融市场参与、养老储备等领域(易行健等[1], 2023; 孙瑞婷等[2], 2022),揭示了收入风险如何通过影响风险偏好和财务规划影响家庭经济行为。近年来,家庭经济韧性逐渐受到关注,部分文献探讨了保险参与、数字金融等因素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张东玲等[3], 2024; 田杰等[4], 2024)。然而,直接探讨收入风险如何影响家庭经济韧性的文献十分有限,二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仍不清晰,特别是保险保障与流动性约束在风险传导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发展型消费是否构成重要的传导路径,尚未得到系统性的实证检验。

因此,本文聚焦于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旨在探讨以下问题:收入风险与家庭经济韧性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保险支出和资产流动性约束如何调节这一关系?发展型消费是否构成重要的中介传

导路径？不同类型的家庭在面对收入风险时表现出怎样的差异？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家庭在收入不确定环境下的适应策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民生保障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是研究视角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从收入风险对家庭单一经济决策的影响，拓展至对家庭整体经济韧性的系统性考察，构建了包含抵御、适应、恢复与转型能力的多维韧性测度指标，是对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二是揭示了保险支出的风险分担效应与资产流动性约束的放大效应所构成的双重调节机制，并验证了发展型消费在风险传导中的中介路径，将收入风险的影响从短期财务维度拓展至长期发展维度，深化了机制理解；三是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生活成本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精准识别了风险冲击下的主要脆弱群体，为差异化政策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2. 理论分析

2.1. 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

作为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动态性的核心概念，家庭经济韧性被定义为家庭在面对外部经济冲击、市场波动及各类不确定性时所展现的适应、调整与恢复的综合能力体系(Raetzke *et al.*, 2022) [5]。它不仅涵盖家庭在财务层面的缓冲储备与风险管理策略，还涉及家庭在资源调配、社会网络调动以及危机应对机制等多维度的响应能力。

根据 Modigliani *et al.* 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理性的家庭通常会基于其预期的终身收入来系统规划各阶段的消费与储蓄，以实现一生效用的最大化。然而，当家庭面临显著的收入风险时，这一跨期优化框架将受到根本性冲击。收入风险的存在迫使家庭调整既定的储蓄与消费路径，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对潜在的收入下滑，同时可能压缩发展性支出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这种被动调整不仅削弱了家庭进行长期财务规划的能力，还导致家庭减少在教育、技能培训、健康维护等关键领域的资源配置，从而在长期内削弱其人力资本积累与财富增长潜力，加剧财务脆弱性(杨碧云等, 2024) [6]。

随着收入风险程度的提高，家庭在财务规划中面临更大的复杂性，更易陷入财务困境的恶性循环：无法按期偿付债务、被迫积累高成本负债、或非意愿地变现资产，这些行为都会侵蚀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度。此外，收入风险的持续存在还可能抑制家庭对成员教育与职业发展的投资，形成“低投资 - 低技能 - 低收入 - 高风险”的负向循环(周京奎等, 2019) [7]。因此，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贯穿于短期抵御与长期恢复两个层面，既通过加剧财务不稳定性削弱其冲击应对能力，也通过抑制人力资本与财富积累损害其发展适应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

H1：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具有抑制作用。

2.2. 发展型消费的中介效应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家庭在面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时，其消费决策将呈现显著的审慎性调整特征。当预期收入波动加剧时，为构建预防性储蓄缓冲，家庭会优先压缩那些虽具有长期价值但短期非刚性的支出项目。发展型消费——主要涵盖教育投入与医疗健康支出——因其投资回报周期长、流动性转换能力弱，往往成为家庭预算调整中首当其冲的削减对象。因此，收入风险通过强化家庭的流动性储备动机，预期将显著抑制其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投入，体现为发展型消费水平的下降(王馨, 2019) [8]。

从家庭韧性形成的动态能力视角看，发展型消费构成了经济韧性的核心能力基石。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对教育、技能与健康的持续投资是提升个体经济适应性、就业稳定性及长期收入增长潜力的根本途径。当收入风险迫使家庭减少此类投资时，其成员的人力资本积累进程将受到直接阻碍，这不仅削弱了家庭未来的创收能力，更降低了其在经济冲击后通过能力重塑实现恢复与转型的可能性(严贝等, 2025)

[9]。

因此，发展型消费在收入风险与家庭经济韧性之间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传导作用。收入风险不仅直接冲击家庭的即期财务状况，更通过“挤压发展型消费”这一行为渠道，削弱了家庭进行人力资本长期投资的能力，从而间接侵蚀其经济韧性的根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a, H2b:

H2a: 收入风险对家庭发展型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H2b: 在控制收入风险后，发展型消费对家庭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2.3. 保险支出和资产流动性约束的双重调节效应

购买保险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家庭通过支付确定的保费，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的、大额的经济损失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家庭可以获得经济补偿，从而避免因单一冲击导致家庭消费水平急剧下降或资产大幅缩水。这种基于大数法则的风险分担机制，能够有效平滑家庭生命周期内的财务波动，降低其面临的整体财务风险敞口，从而直接增强家庭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稳定性和恢复能力(岳爱等, 2013) [10]。

然而，保险支出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并非全然正向。首先，保费支出会直接占用家庭当期的可支配收入，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即用于支付保费的资金，挤占了家庭原本可能用于增加即期消费、进行其他金融资产投资或积累更多自由储蓄的资源(秦芳等, 2024) [11]。这种财务资源的重新配置可能削弱家庭财务安排的灵活性。因此，保险支出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是一个包含“风险转移与缓冲增强”的积极效应和“资源挤占”的潜在挑战的复杂综合体。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

H3: 保险支出弱化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但同时可能因替代效应加剧家庭的收入风险。

预防性储蓄理论指出，面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家庭通常通过增加储蓄来应对潜在的经济冲击，以增强其财务弹性(Lusardi, 1998) [12]。然而，流动性约束理论指出，这一理想的储蓄动机在现实中可能受到严重制约。当家庭面临信贷市场准入限制、融资成本过高或现有资产流动性不足时，其积累预防性储蓄的能力将被削弱，导致即使收入风险升高，家庭也无法建立起足够的财务储备。

在不确定性冲击实际发生时，家庭往往需要迅速调整支出或动用手头储备资金应对紧急需求。然而，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严重限制了这种必要的财务灵活性。更严重的是，严峻的流动性约束可能迫使家庭采取一系列损害长期财务健康的应急措施，例如提前支取受惩罚的定期储蓄、大幅折价变卖生产性资产，或依赖利率极高的非正规信贷来填补短期现金流缺口(万广华等, 2001) [13]。这些行为不仅打乱了家庭基于长期收入预期的消费平滑路径，还可能陷入“收入下降→借贷应急→债务负担加重→进一步抑制消费与投资”的恶性循环。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4:

H4: 家庭资产流动性约束会加剧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负效应。

3. 数据、变量与模型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该调查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微观入户追踪调查项目。本研究选取了 CHFS 在 2015、2017、2019、2021 及 2023 年共五个调查年份的公开数据，

构成了一个跨度为十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

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进行了匹配, 研究样本限定为年龄在 16 岁至 60 岁之间的户主所在家庭。为确保数据质量, 剔除了关键变量存在缺失或异常值的观测样本, 对所有价值型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一个包含 16,743 个家庭 - 年份有效观测值的分析样本。

3.2. 模型设计

为考察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 本文设定的模型如下:

$$Resilience_{it} = \alpha_0 + \beta_0 IR_{it} + \rho_0 Controls_{it} + \gamma_{pt} + \lambd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Resilience_{it}$ 代表家庭 i 在时期 t 的经济韧性水平; IR_{it} 代表家庭 i 在时期 t 的收入风险水平; β_0 用于衡量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净效应; $Controls_{it}$ 表示控制变量; γ_{pt} 和 λ_{it} 分别控制了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 ε_{it} 代表随机误差项。

3.3. 变量选择

3.3.1. 经济韧性的测度

以李晗等(2021) [14]提出测算经济韧性指标为基础, 本研究引入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家庭的经济韧性, 以家庭人均消费额取对数作为福利水平的度量指标。首先, 在模型构建的过程中, 假设福利水平遵循一阶 Markov 过程, 并引入福利水平的一阶滞后变量, 以反映上一期福利对当前福利的影响。具体模型的设定如下:

$$W_{it} = \sum_{j=1}^3 \beta_M W_{i,t-1}^j + \gamma_M X_{it} + \varepsilon_{Mit} \quad (2)$$

公式(2)将 t 期的福利水平 W_{it} 建模为 $t-1$ 期福利 $W_{i,t-1}^j$ 的多项式函数, 同时纳入相关特征变量 X_{it} 和随机扰动项 ε_{Mit} 。下标 M 表示期望方程, j 则表示高阶中心矩的阶数。鉴于多重均衡贫困陷阱理论典型的 S 形动态特征, 本文在福利水平的多项式中选择了 1 至 3 阶矩进行引入。

其次, 考虑到人均消费水平必须为非负值, 本文假设因变量遵循泊松分布, 并采用广义线性模型(GLM)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在公式(2)中的随机误差项为零均值的前提下, 家庭 i 在 t 期的条件均值可表示为:

$$\hat{\mu}_{1it} = E[W_{it} | W_{i,t-1}, X_{it}] = \sum_{j=1}^3 \hat{\beta}_{Mj} W_{i,t-1}^j + \hat{\gamma}_M X_{it} \quad (3)$$

然后, 以下标 V 表示方差方程, 计算出一阶中心矩的残差, 并对二阶中心矩方程进行估计:

$$\hat{\varepsilon}_{Mit}^2 = \sum_{j=1}^3 \beta_{Vj} W_{i,t-1}^j + \gamma_V X_{it} + \varepsilon_{Vit} \quad (4)$$

同时, 依据零均值假设, 使用残差的平方来估计条件方差方程:

$$\hat{\mu}_{2it} = \sum_{j=1}^3 \hat{\beta}_{Vj} W_{i,t-1}^j + \hat{\gamma}_V X_{it} \quad (5)$$

根据计算得出的条件均值 $\hat{\mu}_{1it}$ 与条件方差 $\hat{\mu}_{2it}$, 可以描述家庭 i 在 t 期的福利水平 W_{it} , 假设分布函数形式和矩估计相结合, 可以同时估计家庭在特定时期的条件概率密度以及互补累积分布函数, 由此推算出家庭 i 在 t 期达到某一最低幸福值标准的概率。经济韧性($\hat{\rho}$)则定义为家庭 i 在 t 期福利水平超过某一设定阈值 \bar{W} 的概率。根据世界银行 2015 年公布的标准, 本文将人均日消费 1.9 美元作为阈值 \bar{W} , 并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汇率将其转换为 2013 年的可比数据。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hat{\rho} \equiv P(W_{it} \geq \bar{W}) = \bar{F}_{W_{it}}(\bar{W}; \hat{\mu}_{1it}(W_{it}, X_{it}), \hat{\mu}_{2it}(W_{it}, X_{it})) \quad (6)$$

3.3.2. 收入风险指标的设定

本文参考 Carroll (1997) [15]的方法, 将组内对数收入方差作为衡量收入风险的指标, 并将其分解为暂时性、永久性收入风险两个维度。在对家庭对数收入的决定方程中, 被表示为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误差的叠加: $y_t = p_t + \varepsilon_t$ 。具体来说, 持久性收入满足: $p_t = p_{t-1} + \eta_t$, 而误差项 ε_t 和 η_t 都为白噪声, 且它们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基于这一设定, 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收入的 d 阶差分表达式, 从而更准确地捕捉和分析收入风险的动态变化。

$$r_d = y_{t+d} - y_t = p_{t+d} + \varepsilon_{t+d} - p_t - \varepsilon_t \quad (7)$$

对式(7)求方差后, 可得:

$$\sigma^2(r_d) = v_d = d\sigma_\eta^2 + 2\sigma_\varepsilon^2 \quad (8)$$

在式(8)中, 本文分别用两个变量 σ_η^2 与 σ_ε^2 来表示持久性收入风险和暂时性收入风险。参考罗楚亮 (2004) [16]的研究方法, 根据户主的年龄(划分为 7 组)、教育程度(分为 4 组)、工作行业(共 21 类)、性别以及居住省份对家庭进行分类。然后, 计算每个分组家庭的组内对数收入方差, 并将这些方差进行加总标准化处理, 从而得到了整体家庭的收入风险。

进一步地, 当 d 的取值大于 1 (在本研究中, 设定 $d = 2$)时, 将上述的整体收入风险分解为持久性收入风险和暂时性收入风险。这种分解方式为本文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 以理解不同来源的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 表示如下:

$$s_\eta^2 = v_d - v_{d-1} \quad (9)$$

$$s_\varepsilon^2 = 0.5v_{d-1} - 0.5(d-1)s_\eta^2 \quad (10)$$

在式(9)和式(10)中, 分别估算了持久性收入风险 s_η^2 和暂时性收入风险 s_ε^2 。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key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经济韧性	16,743	0.181	0.173	0.000	0.147	1.000
收入风险	16,743	6.936	8.003	0.000	3.578	87.623
户口	16,743	0.646	0.478	0.000	1.000	1.000
年龄	16,743	44.038	9.679	16.000	45.000	60.000
性别	16,743	0.485	0.500	0.000	0.000	1.000
婚姻状况	16,743	0.878	0.327	0.000	1.000	1.000
教育水平	16,743	10.660	15.252	0	10.782	22
家庭人口	16,743	2.656	1.197	1.000	3.000	12.000
健康状况	16,743	0.124	0.330	0.000	0.000	1.000
净资产	16,743	80.858	117.989	-7.061	38.560	596.125
负债	16,743	113826.667	280.175	0.000	156.000	1368.000
人均 GDP	16,743	68199.422	31569.340	25100.920	61076.170	189988.000

3.3.3. 控制变量

为了全面探究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净影响,参考甘犁等[17]的做法,本文选取户主和家庭两个类别的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包括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家庭特征变量涵盖了家庭人口、负债、净资产、户口等;地区层面控制了人均GDP。由表1可知,家庭经济韧性均值为0.181,标准差为0.173,表明样本家庭整体上面临着较高的经济脆弱性;收入风险均值为6.936,标准差为8.003,说明样本中的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水平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仅控制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模型(2)加入全部控制变量,模型(3)和(4)则分别考察年份固定效应和同时控制年份与省份固定效应的情形。四组回归结果均高度一致,表明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存在稳健的抑制作用。以最完整的模型(4)为例,收入风险每上升1个单位,家庭经济韧性将显著下降0.001个单位,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发现强有力地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H1。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收入风险	-0.002*** (-16.514)	-0.001*** (-11.456)	-0.001*** (-8.564)	-0.001*** (-7.087)
户口		-0.040*** (-18.086)	-0.037*** (-19.614)	-0.036*** (-18.529)
年龄		-0.003*** (-27.734)	-0.003*** (-27.870)	-0.003*** (-27.598)
性别		0.002 (1.185)	0.002 (1.149)	0.002 (1.361)
婚姻状况		-0.041*** (-12.376)	-0.029*** (-11.894)	-0.027*** (-11.006)
教育水平		-0.128*** (-18.13)	-0.129*** (-18.20)	-0.108*** (-15.64)
家庭人口		-0.034*** (-37.503)	-0.027*** (-36.789)	-0.026*** (-34.988)
健康状况		-0.008*** (-2.606)	-0.003 (-2.532)	-0.002 (-1.811)
净资产		0.000*** (53.707)	0.000*** (51.581)	0.000*** (40.583)
个人GDP		0.000*** (21.775)	0.000*** (19.874)	0.000*** (14.653)
负债		-0.000*** (-11.956)	0.000*** (-11.287)	0.000*** (-12.225)
年份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是
常数	0.387*** (35.903)	0.475*** (74.831)	0.382*** (68.494)	0.486*** (52.280)
观测量	16,743	16,743	16,743	16,743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相符。户口对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凸显出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家庭在社会保障与收入稳定性方面的系统性弱势；家庭规模系数显著为负，可能与家庭抚养负担有关；负债系数显著为负，证实了高杠杆对家庭财务灵活性的侵蚀；净资产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系数极小，说明财富的积累虽能提升韧性但可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

4.2.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4.2.1. 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社区内其他家庭收入风险的中位数”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本文选取“社区内其他家庭收入风险的中位数”作为收入风险的工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同一社区家庭面临共同的劳动力市场与政策环境，使得社区内其他家庭的收入风险与目标家庭收入风险高度相关，同时其他家庭的收入风险作为社区层面变量不会直接干扰目标家庭的经济韧性决策，满足排他性约束，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学术规范性，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 = 0.373, $t = 35.967$)，表明社区层面的典型收入风险与家庭个体面临的收入风险高度正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为 1293.6，远超过临界值，强有力地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第二阶段回归中，在控制内生性后，收入风险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系数 = -0.001, $t = -2.796$)，其绝对值与基准回归相近，说明在考虑了内生性偏误后，收入风险对经济韧性的负面影响依然稳健成立。

Table 3.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3.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第一阶段	(2) 第二阶段	(3) 改变阈值	(4) 改变阈值	(5) 剔除出直辖市	(6) 持久性收入	(7) 暂时性收入
	收入风险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收入风险		-0.001*** (-2.796)	-0.001*** (-5.951)	-0.001*** (-5.964)	-0.001*** (-5.596)		
收入风险中位数	0.373*** (35.967)						
持久性收入风险						0.011** (2.550)	
暂时性收入风险							-0.001** (-2.0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1.420*** (-3.064)	0.483*** (34.607)	0.480*** (44.742)	0.481*** (44.792)	0.323*** (42.553)	0.482*** (33.880)	0.482*** (44.748)
观测量	16,743	16,743	16,743	16,743	19164	16,743	16,74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4.2.2. 调整贫困阈值

为检验结论是否对特定阈值敏感，本文分别采用世界银行 2022 年公布的 3.65 美元和 2025 年 6 月公布的 3 美元作为新的贫困线阈值重新计算经济韧性。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层级的国际贫困线下，收入风险的负面影响依然高度显著，表明本文结论对于国际通行的福利阈值选择不敏感，具有稳健性。

4.2.3. 排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具有独特的政策红利和更完善的社保体系，其家庭应对收入风险的能力可能与全国一般水平存在系统性差异。在剔除所有直辖市家庭样本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证实了收入风险对经济韧性的抑制作用是中国广大非直辖市地区所面临的普遍现实。

4.2.4. 分解收入风险

将总收入风险分解为持久性收入风险和暂时性收入风险后，回归结果揭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效应：暂时性收入风险的系数显著为负，印证了预防性储蓄理论，这类风险突如其来，家庭缺乏准备，直接削弱短期经济韧性；持久性收入风险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家庭感知到收入不确定性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的压力时，反而会触发积极的预防性行为调整，如寻求更稳定的就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更积极地参与保险等。

4.3. 发展型消费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探究收入风险影响家庭经济韧性的内在行为路径，本节引入“发展型消费”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表4报告了基于经典三步法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首先，收入风险对发展型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如第(2)列所示，收入风险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发展型消费显著下降0.002个单位(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当家庭面临收入不确定性时，会系统性地减少在教育和医疗等长期人力资本上的投资，验证了假说H2a。

其次，发展型消费对家庭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3)列显示，在控制收入风险及其他变量后，发展型消费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为0.016，且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意味着，家庭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其未来消费维持在贫困线以上的概率将显著提高1.6个百分点，验证了假说H2b。

计算可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3.2%。这一比例虽然相对较小，但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均不可忽视。它清晰地表明，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抑制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挤压发展型消费”这一行为渠道实现的。这一发现将收入风险的影响从短期财务维度扩展到了长期发展维度。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velopmental consumption

表 4. 发展型消费的中介效应

变量	(1)	(2)	(3)
	家庭经济韧性	发展型消费	家庭经济韧性
发展型消费			0.016*** (12.11)
收入风险	-0.001*** (-2.94)	-0.002** (-2.00)	-0.001*** (-3.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	0.529*** (10.96)	8.331*** (83.16)	0.386*** (7.51)
观测量	16,743	16,743	16,743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4.4. 保险支出与资产流动性约束的双重调节效应

为深入剖析收入风险抑制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本文检验了保险支出与资产流动性约束的调节

效应。结果如表 5 所示。

首先，保险支出作为主动的风险管理工具，其与收入风险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0.001，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保险确实能有效缓冲收入风险的冲击，印证了保险经典的风险转移功能。然而，保险支出的主项系数虽显著但为负，揭示了其内在的“成本-收益”矛盾：保费支出挤占了家庭当期可用于消费或投资的流动性，产生了“替代效应”。这一细微差别极具政策价值，提示若保费负担过重，其“替代效应”可能超过“保障效应”，从而削弱甚至逆转其积极作用。

其次，资产流动性约束与收入风险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0.013，在 1%水平上显著)，证实资产流动性约束会急剧放大收入风险的破坏力。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在于，缺乏缓冲资产和信贷渠道的家庭，其财务状况是“刚性”的，无法进行跨期平滑。当不确定的收入冲击来临时，它们无法通过借贷或动用储蓄来维持消费水平，被迫进行痛苦的、即时的消费削减。值得注意的是，资产流动性约束主项本身不显著，说明“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短缺”的结合才是真正的“毒性组合”。

Table 5. Results of the dual regulation effect

表 5. 双重调节效应结果

变量	(1) 保险支出	(2) 资产流动性约束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收入风险	-0.001*** (-6.769)	-0.001*** (-5.810)
保险支出	0.001*** (18.965)	
收入风险*保险支出	0.001*** (4.436)	
收入风险*资产流动性约束		-0.013*** (-3.630)
资产流动性约束		0.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常数	0.483*** (45.326)	0.486*** (44.977)
观测量	16,743	16,74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4.5. 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揭示了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整体负面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在不同特征的家庭间并非均质。本文从人力资本(内部资源)、社会资本(外部资源)与生活成本(现实约束)三个关键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这三个维度可以构成一个家庭在应对风险时所需的资源与约束条件，结果如表 6 所示。

首先，在人力资本维度，教育和收入构成了抵御收入风险的核心防线。分析表明，尽管收入风险对高受教育程度和高收入家庭的经济韧性同样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其负面影响相较于低人力资本家庭更弱。这主要是因为，更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应对策略：高学历者通常拥有更广阔的职业选择、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使其在收入波动时能更快地调整财务规划或转换工作岗位；而高收入家庭则拥有更雄厚的财务缓冲垫，能够通过动用储蓄或投资组合来平滑消费，从而更有效地吸

收风险冲击。因此，人力资本的差异塑造了家庭面对风险时截然不同的“软实力”与“硬实力”，导致了风险承受能力的系统性分化。

其次，在社会资本维度，以转移支出和通信支出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发挥着重要的保险替代功能。回归结果显示，收入风险对转移支出和通信支出较低的家庭，其经济韧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这深刻揭示了非正式制度在风险分担中的关键作用：转移支出(礼金、赠予等)是社会网络中进行物质帮扶的直接体现，能在家庭遭遇收入冲击时提供及时的现金流支持；而通信支出则维系着社会关系的广度与活跃度，是获取就业信息、商业机会乃至无偿帮助等隐性支持的重要渠道。对于社会资本薄弱的家庭而言，他们无法依赖这张无形的“安全网”来分散风险，因而在面对收入不确定性时，表现得更为孤立无援，经济韧性也更易受到侵蚀。

成本维度，家庭的支出结构决定了其财务调整的弹性空间。异质性分析揭示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则理性的现象：收入风险对人均消费额和医疗支出较低的家庭，其经济韧性的抑制作用反而相对较小。其内在逻辑在于，低消费家庭其必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较低，在面对收入下降时，拥有更大的余地来压缩非必要开支，从而保持了较高的消费调整灵活性。同样，低医疗支出意味着家庭受健康这一重大、刚性支出的潜在威胁较小，财务预算的不确定性也因此降低。相比之下，高生活成本家庭(尤其是高医疗支出家庭)的预算刚性更强，当收入风险来临时，难以进行有效的支出削减，从而更易陷入财务困境，经济韧性受到的冲击也更为剧烈。

综上所述，低人力资本、低社会资本和高生活成本的家庭构成了经济系统中的脆弱群体，他们承受着更大的风险暴露和更深的韧性损伤。这一发现旨在提升家庭经济韧性的公共政策必须注重精准性，应将资源与关注更多地投向这些弱势群体，通过强化其人力资本、培育其社会网络、并缓解其刚性支出压力，从而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社会。

Table 6. Heterogeneity test
表 6. 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人力资本		(2) 社会资本		(3) 生活成本	
	受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	转移支出	通信支出	人均消费额	医疗支出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
收入风险	-0.001*** (-4.918)	-0.001*** (-4.284)	-0.001*** (-5.861)	-0.001*** (-4.512)	-0.001*** (-3.759)	-0.001*** (-4.29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0.495*** (28.821)	0.494*** (29.344)	0.526*** (26.852)	0.453*** (25.818)	0.631*** (30.078)	0.475*** (23.855)
观测量	16,743	16,743	16,743	16,743	16,743	16,74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本文利用 2015 至 2023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五轮微观追踪数据，实证发现收入风险对家庭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收入风险每上升 1 个单位，家庭经济韧性下降 0.001 个单位，其中暂时性收入风险的负面冲击尤为剧烈。机制分析表明，保险支出能够有效缓冲收入风险的负面影响，而资产流动性约束则显著放大这一负面效应；发展型消费在收入风险与家庭经济韧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

作用,收入风险通过抑制家庭在教育 and 医疗等方面的长期投资,间接侵蚀经济韧性,中介效应约占总效应的 3.2%。异质性分析发现,从人力资本角度看,收入风险对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的经济韧性削弱作用更为显著;从社会资本角度看,收入风险对通信和礼金支出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从生活成本角度看,收入风险对消费和医疗支出较低的家庭抑制作用相对较小。

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强化收入稳定性保障机制,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特别是加强对零工经济、灵活就业等新业态从业者的收入保障。其次,应优化家庭风险管理工具,推动普惠型保险产品发展,通过财政补贴降低参保门槛,同时深化普惠金融改革,创新应急信贷产品,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再次,应保障家庭长期发展能力的持续投入,通过教育资助、学费减免、医疗救助等方式,确保家庭在收入波动时期仍能维持必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最后,需实施差异化精准帮扶,对低收入、低学历家庭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投入,对社会资本薄弱家庭加强社区支持网络建设,对高生活成本地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实现从“被动救济”向“主动预警和干预”的治理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 [1] 易行健,陈俊,周聪,等.收入风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 CHFS 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科学学报,2023,26(10):76-94.
- [2] 孙瑞婷,熊学萍,郭晨光.收入水平、收入不确定性与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6-46.
- [3] 张东玲,刘妍.基本医疗保险参与增强居民家庭经济韧性了吗?[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4):59-68.
- [4] 田杰,廖露,王淑敏.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0(1):132-143.
- [5] Raetzke, S., Duchek, S., Maynard, M.T. and Wohlgemuth, M. (2022) Resilience in Organization-Related Research: An Integrative Conceptual Review across Disciplines and Levels of 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7**, 867-897. <https://doi.org/10.1037/apl0000952>
- [6] 杨碧云,黎卓妍,易行健,等.数字鸿沟与家庭商业保险决策[J].保险研究,2024(9):44-59.
- [7] 周京奎,王贵东,黄征学.生产率进步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9,54(1):100-115.
- [8] 王馨.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农民工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基于 5 省 18 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1(5):138-146.
- [9] 严贝,闫婷婷,耿菲,等.数字消费、地区创新与流通业韧性——基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商业经济研究,2025(10):132-135.
- [10] 岳爱,杨鑫,常芳,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日常费用支出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3(8):101-108.
- [11] 秦芳,刘佳.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视角[J].南方金融,2024(8):35-50.
- [12] Lusardi, A. (1998)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449-453.
- [13] 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35-44.
- [14] 李晗,陆迁.精准扶贫与贫困家庭复原力:基于 CHFS 微观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1(2):28-41.
- [15] Carroll, C.D. (1997) Buffer-Stock Saving and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1-55. <https://doi.org/10.1162/003355397555109>
- [16] 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4(4):100-106.
- [17] 甘犁,尹志超,贾男,等.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J].金融研究,2013(4):1-14.